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13.08.020

西方国家理论研究述评

周长友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402168)

摘要:西方政治学中的传统国家理论可分为契约论视角的公共权力国家观和掠夺论视角的工具主义国家观。行为主义时期的政治学以政治体系和政治共同体研究为主要视角,后行为主义时代随“找回国家”而复兴的国家理论视角有系统主导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以及历史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国家观等。

关键词:国家;政治体系;契约论;掠夺论;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425(2013)08-0093-05

国家理论(state theory)研究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也是争议分歧较多的领域之一。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到当代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他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关注国家理论问题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思考。随着政治学后行为主义时代学者们对政治系统论的批判和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国家社会角色的重新阐释,国家理论研究再次成为了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主题之一。本文尝试对西方国家理论研究的思想脉络进行初步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从而希望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主题提供理论参考。

一、国家与国家理论

“国家”的概念是政治学中争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学者们通常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一概念:一是指一种历史实体或一种哲学思想,另一则指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持久或特定当代现象^[1]。

英语“State”一词源于拉丁词“Status”,其本义是指立场、状况、条件或身份。中世纪晚期的法学家和学者把“Status”用作政治术语,既指所处的优越状况、条件和地位,也指整个王国的地位。这些人著作中的“Status”由于被后人译作“State”从而引起了人们的误解,认为使用“Status”的人已经获得了现代国家概念。“State”作为现代国家概念指

“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形式,它构成某一有限领土内的最高政治权威”^{[2]71}是后来形成的。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基础》中指出促使Status向State转变的是“统治者维持其状况的思想——这仅意味着维护自身地位,到存在一个单独的法律和宪法秩序,即国家秩序,而统治者有责任维持这一秩序的思想。这种转变的后果是国家权力而非统治者的权力终于被看作政府的基础。这一思想又使国家按照现代特有的术语概念化了,即被当作自身领土内法律和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和公民联合的唯一适当的客体”^{[2]72}。

在促使现代国家观念形成过程中,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和法国的让·博丹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马基雅维利将国家视为追求特殊道德即“国家理性”的自治和世俗王国^[3],而让·博丹则更进一步强调了国家的主权属性,即一种包含制定、适用和保证法律之能力的绝对而无上的权力^{[2]74}。它借以建立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是与主权概念同时出现的,而无主权的国家则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即国家必须是个自决的实体。

所谓国家理论(State theory)是指对于国家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主要涉及国家政治统治的形式、实质、特征、作用和历史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4]121}。国家理论作为一个包容范围庞大、内涵及其丰富的研究领域,构成了

收稿日期: 2013-01-17

作者简介: 周长友(1982—),男,硕士,研究方向: 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学。

经验政治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中心联络点。国家理论和政治思想的部分重叠,在当代主要是由“经验政治理论”促成的。这一理论力图使经验分析地发现系统化,并把这些发现同关于政府目的和人类本性结构的根本价值分歧联系起来。国家理论和经验分析之间的重叠部分,是由理论指导下的内容甚广的各种研究所组成的,如国际关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等。

国家理论作为政治思想和当代政治科学中经验分析的中心联结的出现以及公共选择学派和激进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现今的政治学研究现状。例如,社会心理政治理论就不再扮演重要角色,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影响也不再扩大。随着国家理论重要性的重新提高,政治科学的其他领域也繁荣起来。如公共政策研究超出了20世纪60年代多元主义决策研究的范围,包括了对政策输出和预算分析的系统关注,政治的经济学分析增强了对跨国政策输出的研究。随着组织研究方面所取得成就的日益增多,公共选择理论和激进的政治的经济学也同样把公共管理大量融进政治科学思想的主流,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科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二、契约论公共权力国家观与掠夺论工具主义国家观

“国家”既是一个现实性的实然建构,同时也是一个理想化的应然建构。在早期的国家理论中,学者们通常从应然性理论建构的视角分析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使得以逻辑推理为主要论述方式的国家契约论建构成为这一时期国家观的典型。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建构的逐渐完成,人们发现原本理想化的国家观念并不如启蒙思想家所描述的那样完美,现实中的国家充满了各种矛盾,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远未能实现。这促使学者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现实的国家政治生活,从而产生了掠夺论视角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并对政治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

契约论视角的公共权力国家观以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以及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为代表。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为自身利益而互相战争的野蛮状态^[7]。为了结束这样的野

蛮状态,人们通过理性决定“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5]。这就是国家的起源——伟大利维坦的诞生。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自由和平等的状态,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公认的法律,也没有公共权力充当裁判者,从而存在种种不便。因此,人们通过彼此之间订立契约的形式联合起来建立了公共权力国家“以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6]。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当“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7]。因此,原本生活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在理性的昭示下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建立了国家。

掠夺论工具主义国家观通常基于政治现实关注而将国家视为保证统治秩序的工具或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掠夺论工具主义国家观的典型体现为“强权国家”观念,甚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也可视为其中之一。早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他就将国家描述为一种有其自身的“理由”或压倒一切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抵御来自内外的反抗的组织^{[3][23]}。近代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更进一步主张政治是一种“敌友”关系,国家被视为仅仅涉及暴力斗争和战争的组织^[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段,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9]因此,“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0]。

除了契约论视角的公共权力国家观和掠夺论视角的工具主义国家观之外,其他如法律国家观、合法性国家观和“警察国家”理论等也构成传统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国家理论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

三、国家的政治体系分析

传统国家理论由于过于关注正式法律和制度因素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了现实政治运作的实在逻辑而在战后为许多学者所诟病。正是在对传统国家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充分借鉴了当代其他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将政治体系理论引入了比较政治学研究。

“体系理论”(System Theory)是指那些试图以“政治体系”作为政治学核心概念并以此展开政治分析的学术努力及其成果。伊斯顿在《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一书中提出政治体系的概念并将社会政治生活定义为一个由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组成的且与政治环境进行输入—输出式沟通的具有自动适应性的系统^[11]。此后数年间,政治体系研究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的主流学术话语。伴随着对传统国家理论研究的激烈批判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迅速发展,国家一词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话语中近乎消失。作为行为主义时期国家理论研究中的主流学术话语,伊斯顿的政治体系理论和阿尔蒙德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框架成为这一时期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主流研究范式。

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以有机复合的政治互动行为作为分析起点、以系统的生存即系统的平衡和自我维持作为分析内容、以输入—输出和反馈作为核心概念而展开对于政治系统的整体性宏观分析^[12]。伊斯顿设计的系统分析模型通过将政治体系最具一般性的变项抽离出来而列为一个完整的分析系统,从而将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力量置于交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中加以考察,并试图在宏观结构与微观要素之间建立可供观察和研究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治的理论体系。

阿尔蒙德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框架在沿袭政治系统的基本分析概念基础之上又引入了结构和功能及其区分和互动的思想以及相应的研究变量和指标^[13]。结构—功能主义以政治体系的政治结构为分析起点,以体系结构的功能,特别是其中政府之功能作为分析重点,以考察这些功能对于整个体系的维持和调适为主要内容。在对具体功能的分析中,结构—功能分析因其对输入—输出过程解析为具体的功能而使早期政治体系理论中的“黑箱”范围进一步缩小,从而对于具体功能的

论述更加详尽而对政治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因理论抽象与经验内涵的特殊紧密联系而成为具有非常重要实际影响的研究方法。

体系理论虽然作为政治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范式名噪一时,但仍有学者针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认为政治体系分析方法过于宏观而显得太过空泛,同时体系理论太注重于行为主义分析而忽视了政治中的制度、组织和媒体等方面的分析。相比于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泛的缺陷,但由于过于追求系统的“均衡”而被许多学者认为过于保守^{[4][127]}。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崩溃等现实政治事件的发生,人们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日益增多,从而促进了新的替代理论的发展。新的替代理论主要体现为两个方向上的学术努力:一是从体系理论所批判的国家理论入手“回到国家去”,另一则是在对原有体系理论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发展从而为原有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四、当代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后行为主义时代的国家理论奠基基于对行为主义时期系统理论的输入—输出分析方法和阿尔蒙德等人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深入反思批判。在此基础上,主张“回到国家”的学者们在充分吸收行为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原有国家理论进行了梳理。当代国家理论研究理论流派众多,笔者将在此列举几个典型的国家研究研究视角,如文化主义视角、系统主导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理性主义视角、新制度主义视角和转型国家研究等^[14]。

1. 文化主义视角。其研究者如格尔茨不同于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公民文化的政治分析,在关于印尼巴厘王国的研究过程中他将兴趣指向“场面、仪式,以及将巴厘文化中的统治困境如社会不平等和地位荣耀等进行公开的戏剧化”特点,通过这样的场景“权力为场面服务,而不是场面为权力服务”为国家融合和制度构建提供支持。另一位政治学者莱廷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符号系统会暗示什么值得奋斗,以及什么是常识,改变它似乎并没有意义”的观点,由此为国家团聚能力和塑造社会的能力设定了文化解释。

2. 系统主导的结构主义视角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新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构—功能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流研究范式,但近年来,学者们关于政治系统自主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东亚国家发展模式的解读和对国家“崩溃”的关注中。如戈德斯通(Goldstone)的《现代世界早期的革命与反叛》对于历史上国家覆灭的关注,认为国家遭遇以下几种危机时就会崩溃——国家财政危机、精英层严重分裂,以及存在大众群体进行动员的潜力和倾向等。

3. 理性主义。它作为西方行为革命后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辉煌时期已进入了国家理论研究,如贝茨(Bates)的《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一书中,通过对于一些关键人物的行为和选择的调查分析,告诉我们整个国家的病症所在。他更多地关注了特殊制度环境因素对于非洲国家领导人做出行为选择的影响。理性选择方法和制度约束之间的融合使政治学家们不再封闭性地关注极为广阔的宏大结构或主体叙事,而转向一种更具操作性的研究领域。

4. 历史制度主义在国家建构理论占有更加重要的理论地位。许多制度主义学者们通常将政治制度视为“根据制度利益而自主行动”,而不太关注文化、关系和理性选择的价值,然而无论是文化、结构和还是个人选择均离不开特定的制度环境而存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制度主义传统因行为主义的兴起而曾一度低落,但很快重新受到学者们的重新推崇。亨廷顿(Huntington)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建构之间关系的关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近年来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关于公共制度对于国家政治的持续影响的关注将是国家研究中关注的重要主题,特别是一系列面临重新创建制度的国家这更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5. 新制度主义主要从经济学中产权的角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国家的性质和目的。产权学派认为决定一项经济活动交易费用的通常不是市场而是国家^[15]。在此基础上,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将产权学派的国家理论运用于国家兴衰的比较研究。除此之外,诺思还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基本目的应该是确立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包括形成经济竞争与合作基础的产权结构规则和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的规则。他认为这两项规则之间通常存在着紧

张和冲突,“上述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的收入的最大化”^[16]。两项规则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也是滋生政治动荡的条件,如何在两项规则之间取得平衡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

6. 转型国家理论研究。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即威权国家向自由民主国家转型过渡时期,西方政治学家对于集权主义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认为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前的集权国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军人政权为典型特征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另一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这些国家在短时间内均经历了原有政治体制的迅速崩溃和被新的政治体制所取代的过程。这样的政治体制转型并不同于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民族国家演变的论述,因而极具学术研究价值。这些国家短时间内所经历的政治体制的转型突变为西方政治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威权政体向民主国家转变过渡理论的良好机遇,甚至正是这一政治现实政治事件动摇了系统“均衡”论和阿尔蒙德等人结构—功能分析模型的基础,直接推动了国家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和发展。针对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在转型后出现民主—动荡—集权式循环怪圈,西方学者对于国家民主转型条件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家民主政治转型与市场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于国家政治转型的理论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理论研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738.
- [2] 吴锡安,俞平可. 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 [3] [意]尼利洛·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M]. 潘汉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4] 张小劲,景跃进. 比较政治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21.
- [5] [英]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黎廷弼,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86: 27.
- [6] [英]洛克. 政府论 [M]. 叶启芳, 瞿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 87.
- [7]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34.
- [8] [德]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 [M]. 刘宗坤,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5.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0.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 [11] [美]戴维·伊斯顿. 政治体系: 政治学状况研究 [M]. 马清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56.
- [12] [美]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M]. 王浦劬,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 13.
- [13]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策略 [M]. 曹沛霖, 译.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7: 23.
- [14] [美]马克·I·利希巴赫, 阿兰·S·朱克曼. 比较政治: 理性、文化和结构 [M]. 储建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76.
- [15] [美]科斯, 阿尔钦, 诺思.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4.
- [16] [美]道格拉斯·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57.

(责任编辑 张佑法)

State-Theory Studying in West Countries

ZHOU Chang-you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 Science,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tate-theory studying in west countries has two orientations: public state idea that is based on contrast conception and instrumentalism state idea which is based on predatory theory. The main stream state-theory studying was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studies in behaviorism era. With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and revival in the state-theory studying, structure-functionalism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views had become the main studying orientations in the post-behaviorism era. In this thesis we will briefly introduce the origin and new development of state-theory studying in west countries.

Key words: state-theory; political system; contract theory; predatory theory; neo-institutionalism